

目 录

忆父亲于益之·····	于沛生、于瀚生 (1)
记先父李继辉三兄弟·····	李鸣高 (3)
抗日初期我在绥宁的抗日活动·····	
·····	于刚 (陈泽云) (13)
红军长征过绥宁·····	袁公湘 (18)
武阳之捷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	
·····	邱行湘稿 刘继善整理 (23)
日本侵略军在武阳的罪行·····	唐俊 (36)
劫后武阳·····	文谷 (41)
抗日战争第十八军参加雪峰山战役纪要·····	
·····	杨伯涛 (42)
抗日战争湘西会战茶山战役纪要·····	
·····	罗文浪 (54)
回忆延安抗大的生活·····	于大康 (69)
战火中的苦难历程·····	欧阳柏 (129)
半生军倥·····	袁公信口述刘继善整理 (16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绥宁县地下团组织的活动	
·····	张友松龙道美稿刘继善整理 (199)
绥宁县第二中学简史·····	唐俊稿刘继善整理 (206)
乾隆五年清王朝调大兵镇压我县苗民起义的史料	
·····	龙宪蔚 (220)
关峡苗族乡苗民历史传说·····	李荣民 (225)

忆父亲于益之

于 沪 生

我的父亲于益之，又名于鯤、刘贵卿、于时谦。一九〇七年生，湖南省绥宁县人，十六岁远离家乡投身革命。现将他的经历分四个阶段简述于后：

（一）大革命时期

名于鯤，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党委派于鯤前往东江海陆丰和惠阳、潮阳、普宁等县训练农军，担任陆丰的军事指挥工作，任军委书记兼赤卫团长。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指挥赤卫团配合红军第四师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之后，担任彭湃同志主持的东江特委的军委书记兼红四师参谋长。一九二八年底因作战负伤，调至上海党中央特科，负责掩护我党秘密电台的工作，后调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长兼中央组织部干事。一九三四年春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狱中化名刘贵卿，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七年秋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营救出狱，出狱后断了组织关系，于是回到家乡湖南，在省委（高文华同志）指导下，用于时谦的名字在湖南长沙《观察日报》和老家绥宁县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争取绥宁土匪武装参加抗日工作（详情参见于刚同志所写《抗战初期我在绥宁的抗日活动》一文）。

（二）重庆时期。

一九三九年秋至重庆，在第二战区驻渝办事处做情报工作，不久与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将所得情报交送叶剑英同志，后经叶剑英同志指定与陈家康同志直接联系。此外，还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过。一九四二年当他得知可能又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时，立即向党请示如何应付，经周恩来同志决定：不要转移，以免影响周围的关系，万一被捕，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出身，过去曾参加过共产党，但早已脱离，多年来都是在政府机关作事找饭吃。至于家眷生活，可以由组织照顾，不用担心。于益之同志遵照党的决定，坚守岗位，因此第二次被捕入狱，被关了两年释放出来。

（三）兰州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兰州任章乃器先生经办的上川企业公司（经营文化用品）兰州办事处主任，利用从事商业之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当时主要是对驻新疆的国民党骑兵师杨廷英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策反成功，杨廷英师全部起义过来。此事经过，一野联络部长范明同志很清楚。

（四）新中国时期。

一九四九年九月兰州解放后来到北京，一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地方委员会办公室秘书、付主任，秘书处付处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北京。

于益之同志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坚持革命，跟着党走。他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也未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记先父李继辉三兄弟

李 明 高

我父亲三兄弟的生平，我知道得也不多，因为，在解放前还不大懂事。解放后，革命工作缠身，也未来得及向老人家作系统了解，后来，运动频繁，我不断受极左路线之害，待平反归来时，老人皆已物故。因此，我写的多只是我们一些感性认识，谈不上有什么系统，就算是杂谈吧。

我们李姓，祖籍武攸，即今日之城步苗族自治县，迁到候宁来，大约已四百多年了，祖上的情况不甚了了。只知是在“苗蛮”中很有声望的头人，曾为明清王朝建立过一些功勋，我小时候，看到每年六月六晒龙袍的节日里，祖母宋氏，必将祖传的武将袍服，花翎顶戴拿出来晒，顶戴上是颗红珠子，红珠子的官品是很高的，看来，我家某一代是一个武功不小的武将，此外，还把宝剑、大刀、弓箭也拿出来洗尘，都大而重，非一般人能够使用。

但到了我祖父一代，似乎并不那么荣显，祖父做过小生意，（至今，我亲戚家还保存有他挑过的饺饵担）也蒸过酒，打过豆腐，晚年又当过中医，因此积下来少量田产，可以供养儿子读书进学。

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李继辉生于一八八五年，二儿李继煌，生于一八九一年，三儿李继楨，生于一八九七年，继辉与继煌，恰好赶上了清朝末期的科举，二人同时考上了秀才，后来又同中晚清最后一届举人。这件事，当时，曾轰动了靖州三县，县官都曾率领全县绅士，到离城四十里路的天堂界去迎接，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中举是很难的，而一家有两兄弟同时中举，更是史无前例，故成了一大新闻。

这时，正逢开办新学，湘西地区，开办了常德西路师范学馆，继辉、继煌两兄弟因成绩优异，由县保送入学。后来，帝国主义把八国联军侵华时向清朝勒索的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作培养中国留学生之用，于是兄弟二人又因成绩优异，被送到日本公费留学，三弟继楨也同时跟随哥哥去日学习。两个兄长在北京高等师范，（帝国大学的前身）继楨在读中学。

当时，中国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很多，他们在日本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与林伯渠，郭沫若等许多人都很友善，李继辉思想活跃，在此时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他曾到新加坡等地华工子弟学校任教，宣传过民主革命思想，培养造就了一批爱国华侨，由马来亚返国后，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林老派遣，到贺龙军部作过政治工作，是影响贺龙决心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革命的人中间的一个。

上海大罢工以前，他由党派遣，到了上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并在淞江中学任过教，并从事革命工作，因积劳成病（肺结核），医生嘱咐要择地休养，乃在吴淞口处之横沙岛上，租了一处民房，卧床休养。不久，上海大罢工失败，我家便成了地下联络站，一些斗争中受伤的同志都到

岛上来养伤，一些被追捕的同志，也到岛上来避难，都由他负责联络，并将同志们转移到安全地区去，继续找党

因为肺病已到第三期，横沙岛海风凛凛不适于他的病情，他又回到湖南长沙，在郊区三碓矶择地疗养，旋即病危，逝世于湘雅医院（今湖南医学院），去世后，葬于长沙三碓矶铁坡塆，时为一九二八年。

此时，大革命失败。病危时，他留下遗嘱教母亲将一箱子党的机密文件全部销毁，以防落入反动派手中。留下一些革命书籍，则作教育子孙之用。母亲遵嘱，将全部党内文件销毁后，沉入湘江之中。革命书籍则带回绥宁在市镇老家收藏，后老家被焚，书籍也全部被烧光了。

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平日只知父亲在搞革命工作，她担当助手，并不过问，直至父亲临终时，才知道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一些情况。

李继煌在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历任长沙《大汉民报》、常德《沅湘日报》、上海商务印书馆《农民文艺》等报刊编辑，为商务印书馆编选过中学国文教科书，著译有《中国文化史》、《儒道两家关系论》、《英伦风土志》、《古书源流》等。

李继煌兄弟在日本时，与林伯渠是朝夕相处的好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也过从甚密，但李继煌思想虽倾向革命，却倾向于“教育救国”，不喜参与政治活动，次年回湘，任常德省立第二师范教务主任，在任期中，共产党学生与国民党学生常常发生冲突。一次双方开会，国民党学生大骂共产党学生，共青团员陈德型（大庸人）不堪忍受，用梭标杀死国民党学生一人，出了命案，国民党学生在当时占优势，立即将共产党学生包围，并怀疑共产党

驻常德特派员蒋兆骧为暗中主使人，蒋兆骧当即被国民党学生抓走，我方学生领袖粟裕、滕代远也有生命危险。李继煌得知，连忙暗中进行营救工作，由法院中的朋友出面，说服国民党学生不能私设刑堂，擅自抓人，迫使国民党学生将所抓之人交法院处理，随即秘密将蒋兆骧等人放走，以免遭到国民党学生的报复杀害。学生领袖粟裕、滕代远等获救后，当晚暗至李继煌家商计如何出走，他即教其他同学将他们的行李暗中取出，并筹措了大洋四十元，教他们去投奔革命军去了。

随后，蒋介石反共的嘴脸日益暴露，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全省中学被勒令停办，李继煌经友人介绍到革命军三十六军任中校秘书，激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独裁无耻行径，乃代三十六军军部草拟了《告皖省民众书》，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但三十六军军长迅即被撤换，李继煌也因此脱离了军队。

他与我党著名领袖毛泽东、林伯渠、郭沫若都有友谊关系，他与毛泽东除了在学生时代就有接触外，一九一八年，北洋军阀段琪瑞为了发动内战，向日本借了巨款（即丧权辱国的西原借款），曾激起国人公愤，毛泽东此时在北京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中做政治工作，李继煌、李继桢兄弟也在那儿发动工人反段，协助过毛泽东工作。一九二六年，曾至广州参加中华农学会年会，听了毛泽东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与毛有过接触。因此，毛泽东对他印象很深，一九三七年我哥哥李明松去延安参加革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还向李明松问候过他。他与林伯渠、郭沫若等，则在留日时就是好友，回国后也常相见并在一起游玩过。林伯渠困难时，他还资助过

林（见新近出版的《林伯渠日记》）

他的一生，虽然倾向革命，但更热心于教育，因此，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教书，曾在长沙一中、常德三中、乾城国立商学院，长沙克强农学院等许多学府任过教、当过教授一直到解放后，经林伯渠、粟裕等的介绍，被安置在省文史馆当了馆员，才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

解放后，他一直在省文史馆任文管委员，直到他一九六零年在任内病故为止。在此期间，林伯渠、粟裕、李维汉等中央首长，来湖南时，都曾去看望过他。

李继桢（又名记今），青年时代因家境困难，无力升学，恰逢长沙第一师范招生，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乃下长沙报考，以成绩优秀被录入学，在一师时，因思想激进，会写文章与毛泽东成了好友，经常和毛等学友在桔子洲头，爱晚亭等地读书、吟诗、游泳和畅谈国事。毛泽东诗词《桔子洲头》所述“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便是当时的写照。

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任一师附小主事，李继桢在他手下当教员，感情仍融洽如故。后，毛泽东去北京，李继桢也随兄去了北京，其时，北洋军阀段琪瑞政府因大打内战，军费无着，向日本借了巨额外债（西原借款），亲日卖国，激起了国人义愤，毛泽东去长辛店机器厂发动工人反段，李继桢兄弟也去了，在一齐做发动群众反段的工作。

后，李继桢大哥李继辉应南洋华侨之请，去南洋执教，李继桢想去看看世界，也跟着去了，执教于华侨小学，才与毛

泽东分手。在分手时，毛还曾殷殷嘱咐李继祯，去南洋后，一定要在华侨中宣传中国革命，在南洋点燃革命之火。

从南洋归来，他感到学历不足，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文史系，毕业后，正逢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已上了井冈山，无法取得联系。便由友人介绍，去冯玉祥将军处当了冯玉祥的秘书，并主编过冯玉祥的一份报纸。但他身体不好，不堪戎马劳顿，不久，仍返回教育界，在内蒙、山东、山西等省任教。一九三一年回湖南，执教于长沙、常德等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次合作，他这时正在省立常德中学执教。热情焕发地向同学们鼓吹抗日救国，并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宣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极得进步学生的拥护，进步学生并带领学生去新化、汉寿县农村集镇举办墙报、演讲，宣传抗日。进步学生，都愿到他家中去畅谈国事，并表示了愿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的意愿。此时，国民党为了千方百计地抵制共产党的影响，取缔了进步学生的“学生救国会”，并阴谋迫害进步学生。一些热血青年更迫不及待的只想早日北上。

李继祯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并透露了他和毛泽东本是旧日友好的情况，愿意写信推介他们前去。

他的大儿子李明松刚好已满十八岁，也表示了愿到延安去跟随毛泽东革命的强烈意愿。李继祯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封上写着“面呈毛润之先生”几个大字，告诉他们，此去，沿途必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故还不能露出“毛泽东”的名字，毛润之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用的字号，他一见就会明白的。于是，由李明松带了他的介绍信，带

领其他愿北上抗日的同学从常德出发，奔赴延安去了。

他们到延安后，马上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他们走进中央军委，毛泽东早就在中央军委的窑洞前站着等候他们了，迎进窑洞后还亲自为他们端凳倒茶，亲切交谈，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广胸怀，与国民党官僚的臭架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李明松等好象又到了另一个家一样，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毛泽东看了李继祯的信，边打量明松边说：你的眼睛、脸形都象你的父亲。还风趣地说：“你写的字也象你的父亲吗？他的几个字呀，还是在一师读书的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一番家常话，把大家的拘束全打掉了，谈话顿时热烈起来。

毛泽东教李明松把同学们的名字全写给他之后，又详细地询问了家乡和故人的情况。他问明松：“你父亲的身子很清瘦，现在身体还好吗？”明松说：“托福！他身子还是不大好，不过精神还好。他说如果身子能支持，他也会来了。一再要我见到您，代他向您问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又问：“我记得你还有个伯伯，头顶秃秃的，他现在还好吗？”接着又问了许多他熟悉的师友们的情形，谈得把时间都忘了。直到值班同志进来说：“外面还有人要见毛主席”，同学们才感到不应过多地浪费了毛主席的宝贵时间，提出来向他告辞。毛泽东询问了他们的志愿后，立即从笔筒里取出一支很旧的毛笔，为陕北公学的成仿吾校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仿吾校长：

我的同学李继祯先生是一位有学问且有道德的人，他介绍来的几位学生，要求到陕公学习，现介绍前去，请予接

洽，

此致

敬礼

毛泽东十二月十五日。

临别时，毛泽东又问明松父亲的通讯处，记在纸上后还风趣地说：“我和继祯先生通信，不会打破他的饭碗吧！”又殷殷嘱咐同学们在星期天多来玩，送出门后，还依依不舍地向同学们频频招手，一直目送到同学们在远处消失了为止。

从此以后，毛泽东便与李继祯又建立了通信联系。那时我年纪小，还看不太懂，只记得信封是直式中国式的信封，信笺也是直式的黄纸信笺，毛泽东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就象解放后所看到的毛主席诗词字体一样。每次都写得很长，不但谈时局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也谈了一些家常，一写就是二、三张信纸。毛泽东知道李继祯看不到延安的报刊，便要秘书经常寄一些《解放》“边区文艺”杂志和报纸给他。后面的来信中，谈到了解放区生活的困苦，希望李继祯在湖南发动募捐，支援一下解放区，李继祯当即认真地为延安到处募捐，寄了几次捐款去，毛也每次都写了感谢信，并附上收到捐款的收据。

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又封锁解放区，绝断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邮电来往。我记得他们初次通信是在1938年初或1937年底，最后一次是1938年底或1939年初因武汉沦陷，我们随省立常德中学迁到泸溪县的最初一段时间。前后只联系了一年左右时间，便因国民党重新反共而断绝联系了。

但是，时间虽短，毛泽东的来信却也产生了很大的威力，我记得那段时间，进步学生常到我家来看毛泽东的信件，并

激发了他们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的信念，因此，又有几批学生由李继祯介绍上延安，前后被介绍到延安去的学生，据我所知，约有三十人。其中有一些已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如常德县后乡渐安区的陈辉（原名吴盛辉）在延安成了著名抗战诗人，写下过《十月的歌》诗集，写出了：“我的祖国啊，我是属于你的……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也许吧，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啊，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等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而他也确实实现了他的豪言，在敌人的围困中，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为祖国谱写了一首无比壮烈的歌。而麻阳县龙家堡的陈瘦石同学，曾指挥一个班掩护抗日军政大学晋察冀分校的学员转移，英勇地搏斗到最后一息，以致连日军也不得不佩服中国军人的勇敢精神，为他立墓志哀，表示敬意。

由于李继祯与毛泽东的深厚友谊，果然不出毛的所料，在一九三九年国民党进一步反共之后，国民党特务对李继祯进行迫害了。沅陵行署曾密令逮捕他和一些进步学生，只是由于有人事先把信，他和一些进步学生才得逃脱魔掌，（但也有些来不及逃走的学生被逮捕了）从此，李继祯的饭碗便经常被打破，由泸溪逃奔芷江，由芷江又逃奔武冈、洪江，每到一处，都被特务监视，只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组织不严，逃到一个新地方后，特务的监视令要经若干时日，才能转到另一个地区的特务组织，而另一个地区的特务组织也不一定就遵照执行（如在武冈时，一个邻居的国民党官员，良心发现，就曾对他说：“你实在是一个有道德的正人君子，

不知为什么，上级硬要我监视你的行动。”）

迫害一直到解放才停止，在这段时间，我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也同样遭到监视，往往一个学校没有读完，就被迫转到另一个学校，老被人扣上“共产党崽子”，“赤色学生”的罪名

解放后，因数十年连续教书致患有多种疾病，工作已有困难，一九五一年五月初曾去信毛泽东，毛当即复信道：

记今学兄：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所述困难问题，已告王首道主席斟酌处理。此复

顺颂

教祺！

毛泽东五月十六日

就在五月下旬，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即遵毛主席电告，委托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李锐，对他作了妥善安置于省参事室任省参事之职，一九五六年五月因病逝世于长沙。

李继桢生前著有《天机斋读书记》，以历史为鉴，宣扬了民族气节，痛斥了汉奸走狗，曾对抗战起了一定作用。此文在四十年代初，曾通过段梦辉，在邵阳《中央日报》刊出；段当时为《中央日报社》社长，是进步人士，解放后任中南局新闻署处长，当时的《中央日报》，亦为我党地下组织所控制，

故得刊出。尚有与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夏丏尊先生合译日文哲学著作“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出版于上海开明书店。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

抗战初期我在绥宁的抗日活动

于 刚（陈泽云）

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在湖南地下党省工委及稍后的湖南省委领导下，在湖南不少地区从事过青年工作，其中有八个多月的时间是在绥宁度过的。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平学联号召在校学生返乡，把“一二·九”运动的火种撒播到全国各地去。不少湖南籍的教师、学生在暑期回到了长沙。当时，我是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九三六年春我参加南下扩大宣传之后，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队员。一九三六年四月入团，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返乡是我入党两个多月后的事。这个暑假，我和北京大学的肖敏颂，清华大学的曹国枢、宋绍尧，北师大的曹国智（女）、陈德明（程绯英、女），武汉大学李锐、魏泽同、彭炳朴等返乡的同学与长沙当地的进步青年廖申之（意林、女）、苏镜（女）、唐荣前（女）、章东岩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如成立民先队，创办《湘流》三日刊，组织歌咏队，建立“一九三六”剧社，促使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二次回到长沙，在中学时代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同年十日，我到武汉大学借读。这期间，我在报上看到湖南省政府举办的湖南民众训练班刊登的启事，号召外地湖南籍师生回乡参加民众训练工作。这吸引了我们这些湖南籍的学生。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式比较好，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邀请了各方面人士到湖南民众训练班担任民训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如我党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还有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教授等。我回到长沙，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特立同志。徐老热情鼓励我们利用湖南民众训练这个公开合法的形式，真正到群众中去切切实实的做动员和组织工作。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民众训练班，该班设在第一师范学校内，经过短期听课、听报告和受军事训练，到十二月中旬训练班结业，我被分配到湘西南的绥宁县工作。

绥宁县当时很偏僻，交通不便，是湘西南土匪出没的地方。在我们去绥宁的同时，有位盛××先生被委派去绥宁当县长。盛是长沙人，和教育界的老前辈陈奎生、黄德安先生熟识，我们请几位老人介绍，走访了盛，他对我们相当重视。到了绥宁之后，在我们的推动下，他多次登台演讲，宣传抗日，做了一些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事。和我们同时分配去绥宁的还有一名中学教师赵依依。那时规定，中学教师担任县民训指导员，大学生担任区辅导员。赵是个自由主义者，没有党派成见，跟我们相处得比较好，因此，他宣传抗日的态度也比较积极。

在去绥宁前，湖南省工委的谭丕模同志介绍我们到当地找一个叫于鰓的人，可以依靠他与当地青年建立联系。于鰓

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参加过东江战役，当时是共产党员，作战很勇敢。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搞地下活动，办秘密印刷厂，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回到老家。我们找到他时，他已改名叫于时谦，他的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在绥宁的一段抗日救亡活动，就是和他共同商议开展起来的，我们的基本队伍中有于时谦的亲戚龙有光（当时起了骨干作用）、欧阳柏、李子华、于光德、李世勋等。我们把这批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名义上叫补习班，实际上是阅读进步书籍和省工委会的地下机关报《观察日报》的读书班。我们凭借龙有光任武阳市小学校长的有利条件，选择该校作为活动基地，利用春节在县城和各区召开群众大会，争取当地众多自由职业者，知识青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记得有一个西药房的老板鲁彼得，还有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周让三，都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出壁报，演话报剧，组织群众宣传队到乡村讲演。绥宁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从此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组织了军事训练。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时，我们很注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例如，初到绥宁时，国民党就派来两个军训教官，是复兴社分子。CC和复兴社之间的矛盾，在绥宁小小县城里照样存在。先是军训教官向省里告绥宁县国民党部书记长王生浚的状，说王依靠一批青年人搞共产活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延长我们在绥宁的工作时间。于是，我们支持王生浚反击军训教官，帮助他起草向省里上告军训教官的状纸。又如，龙有光的岳父杨承辉在地方上的地主阶层中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他虽没有在政府作过

官，但也形成了一个山头，武阳地区的一部分握有武装的地方势力（如黄德辉等）就以他为后台，他们相互勾结，形成一派，和以周瑞彬、周瑞璜、苏星云为头子的另一派地主势力有矛盾。周氏兄弟与县党部勾结甚密，苏星云是县警备队的队长，他们算是当权派。这两派之间明争暗斗，经常发生磨擦。杨承辉不仅拉拢一部分地方势力，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通过女婿龙有光也接近一部分思想进步的青年人。当时正是全面抗战的局面，我们对他宣传抗日的道理，不触及他本身利益，他在口头上也表示赞成。他手下的黄德辉，人称“黄队长”，是个土匪头子，经常出入区公所，和区公所的人一道吃酒，聊天。于时谦和这个黄队长熟识，我们就通过于时谦去争取他，想进而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而这个土匪头子知道于时谦有作战经验，正想拉于时谦上山。为此我和于时谦专程到长沙请示党组织，谭丕模介绍我们会见省工委任作民同志，经过研究之后，又找了分管军事工作的聂洪钧同志，聂和于时谦详细研究了情况和对象，最后向于交待了回绥宁去争取土匪的任务。于时谦上山搞了一段争取工作，后因黄队长有所察觉，于的处境危险，就撤了出来，致使这项工作未能成功。

绥宁一段工作，在偏僻的山乡播下了进步的种子。那一批青年骨干，在半年多救亡活动的实践和学习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的后来参加了党，在绥宁建立起地下党支部。

在绥宁工作期间，我曾在《观察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开展文化上的拓荒运动》的文章（见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观察日报》），就我在绥宁民训工作中的感受，指出大